

# 從 PISA 剖析香港青少年對升讀高等教育的期望

何瑞珠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行政與政策學系

黃善國

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

姜培芝、岑國榮

香港學生能力國際評估中心

1965 至 1985 年間，香港高等教育的發展相當緩慢，只有不足 5% 的適齡青年可升讀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大學學位課程，及至 20 世紀 80 年代中起，大學學位開始大量增加，進入大學的適齡人口百分比提升至 18%。2000 年，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更進一步提出要在十年內令香港高等教育的普及率達到 60%。由 2000-2001 至 2005-2006 學年，高等教育參與率已增加至超過 60%。本文探討在香港高等教育擴張後期，中學生對升讀高等教育期望的變化。

本文研究數據來自 2009 年和 2012 年的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以下簡稱 PISA）。2009 年香港的 PISA 調查在該年 5 至 6 月間進行，而 2012 年的調查則在該年 4 至 5 月間進行。本研究嘗試探索以下四個範疇：（1）學生的教育期望在兩次調查期間（2009 至 2012 年）的變化；（2）學生的家庭社經背景與教育期望間的關係；（3）學生能力與教育期望間的關係；（4）家庭社經背景與學生能力等因素對學生期望升讀大學的相對影響程度。

關鍵詞：教育期望；高等教育；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青少年

## 前言

近數十年，各國高等教育快速擴充。美國自 20 世紀 60 年代中期出現大批公立資助大學，使入讀高等教育的學生數字持續上升，在 2003 年有 60% 以上的高中畢業生

就讀高等教育課程（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08）；英國在 90 年代經歷大學學位急速膨脹的情況，政府積極推動高等教育改革，以滿足社會大眾對高等教育的需求；台灣於 90 年代在社會需求、民間教育改革團體的「廣設高中大學」訴求和五年制專科學校轉型的影響下，高等教育發展漸趨普及化和市場化。至於中國，自 90 年代末在經濟現代化的帶動下，高等教育開始擴大招生並進入學位大眾化階段，至 2013 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gross enrollment ratio）已達到 34.5%（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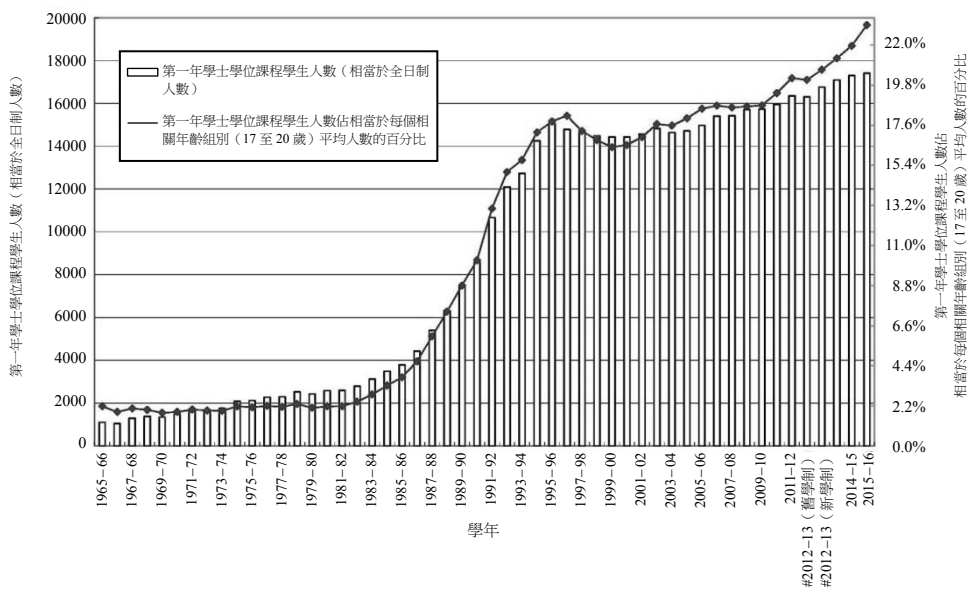
如同各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歷程，香港高等教育亦有相近的發展軌跡，適齡學生入讀學士學位課程的比率由 20 世紀 90 年代的 18% 上升至 2014 年的 38%。儘管學士學位課程的學額有所提升，但單從整體增幅數字不足以顯示高等教育擴張會否加強了不同群體對升讀大學的追求。過往不少文獻指出，在高等教育擴張下，不同的個人和不同社經背景的學生參與高等教育的差異依然存在。本港較早的文獻亦指出，香港高等教育擴張的背後，個人背景和家庭社經地位依然影響個人的教育獲取（educational attainment）（Post, 2004）。然而這些數據只說明早年高等教育的發展情況，並未分析在高等教育步入擴張後期（post-massification）學生教育期望的變化，亦未能回應在高等教育擴張下教育機會均等的問題。相對而言，歐美或東亞社會對高等教育擴張的研究愈來愈豐富，亦漸漸開發相關調查或利用大型數據，討論大學學位增加與青少年教育期望的關係。

反觀香港近十年的高等教育改革，至今仍缺少就香港青少年對升學期望變化的相關研究，亦欠缺具代表性和更新的數據以剖析此課題。本文利用 2009 及 2012 年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下稱 PISA）的數據，探討香港高中學生對升讀高等教育期望的變化，並分析不同群體學生的家庭背景及學業成績對其教育期望的影響；以學生的個人和家庭背景為「先賦」（ascribed）條件及其學業成績為「成就」（achieved）條件，比較兩者對升讀高等教育期望是否有顯著影響。本文將探討以下三個研究問題：（1）由 2009 至 2012 年，學生的教育期望有何變化？（2）學生的教育期望是否與家庭社經背景及學生能力等因素有關？（3）在 2009 至 2012 年間，這些因素的影響力有何變化？

## 香港高等教育的發展

1965 至 1985 年間，香港高等教育的發展相當緩慢，圖一顯示只有不足 5% 的適齡青年可升讀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大學學位課程（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2016）。及至 20 世紀 80 年代中起，大學學位才大量擴展，進入大學的適齡人口百分比增加至 18%（鍾宇平，2005，頁 53）。2000 年，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提出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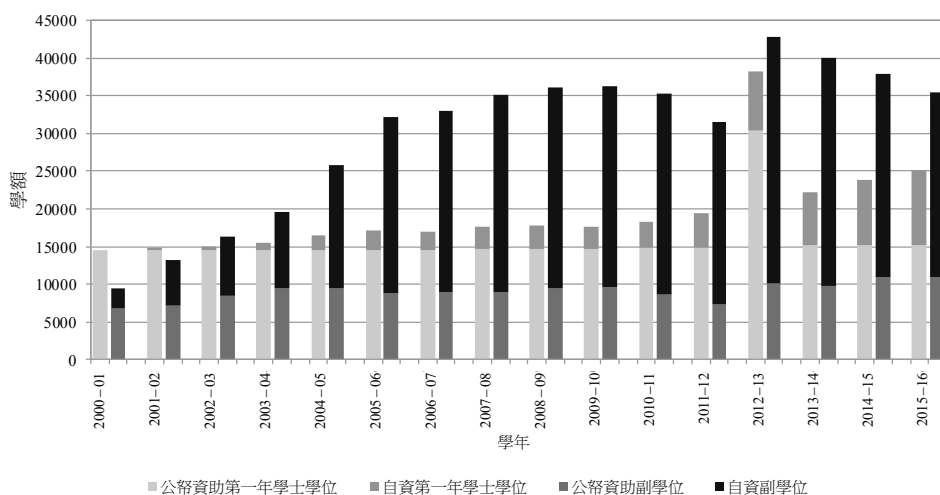
圖一：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學生人數（1965-66 至 2015-16 學年）



註：為配合新學制的實施，院校在 2012-13 學年同時取錄舊學制及新學制的學生。

資料來源：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2016）。

圖二：公帑資助與自資的第一年學士學位及副學位收生學額（2000-01 至 2015-16 學年）



註：由於最後一屆高級程度會考學生及首屆中學文憑試學生同時畢業，2012-13 學年的公帑第一年學士學位學額數目為以往的兩倍。

資料來源：自資專上教育資訊平台（2016）。

十年內令高等教育的普及率達到 60%。這直接令高等教育急速膨脹，尤以自資副學位的學額增幅最為顯著。圖二顯示當中自資副學位課程學額由 2000–2001 學年的 2,468 個大幅增加十倍至 2015–2016 學年的 24,558 個（自資專上教育資訊平台，2016）。實際上，自 2005–2006 年起，高等教育參與率已超過政策規劃的 60%。

然而，根據教育局資料顯示，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學額實際仍維持在約 14,600 個（教育局，2011），近 20 年沒有轉變。引述香港政府於 2014 年 6 月發表的施政匯報指出：「2013–14 學年，適齡學生升讀學士學位課程比率達 38%。連同副學位程度課程，近七成的青少年有機會接受專上教育」（梁振英，2014b，頁 17），這強調學士學位課程比率由早年的 18% 升至 38%，從百分率的數字看似有增長。然而，箇中計算方法是包含了全部升讀資助學士學位的學生（佔適齡人口的 22.7%），和超過 12,500 名獲取錄升讀自資第一年及高年級銜接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才得出 38% 的入讀率（吳克儉，2014）。由此可見，現有的高等教育擴張背後實質是集中於非受資助課程（包括銜接學士學位、副學士、高級文憑及證書課程）。

## 文獻探討

### 學生教育期望的形成

教育期望（educational expectation）亦稱教育期待或預期，包含內在信念、價值或動機，是個人對未來教育目標和計畫的評估（Feliciano, 2006; Goyette, 2008; Kerckhoff, 1976）。有別於教育抱負（educational aspiration），教育期望是較為實際的預期，具有可實現和可達到的目標，亦可說是對取得教育程度的一種「預測」（Fraser & Garg, 2012; Glick & White, 2004; Gutman & Akerman, 2008）。個人期望的形成受結構性因素、外在社會環境和個人與環境的交互作用所影響。

依社會學觀點，個人教育期望是按其個人主觀價值和學業能力因素而形成，家庭背景因素在「地位取得」（status attainment）的過程中亦有十分重要的影響。Blau & Duncan（1967）的「地位取得」模型，以問卷收集男性受訪者於 20 至 64 歲所獲得的教育水平、初次職業地位和目前職業地位的數據；以因徑分析方法發現，父親的教育程度、職業地位首先影響兒子的教育取得，繼而影響兒子日後的職業地位。該結果以教育取得為中介變項來解釋代際傳遞（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的關係。

威斯康辛模型（Wisconsin model）在 20 世紀 50 年代更將教育和職業抱負、學業表現、智力、重要他人等社會心理變項納入分析。結果指出種種社會心理因素影響高中學生對升讀大學的期望，進而影響他們日後的職業地位（Sewell, Haller, & Portes, 1969; Sewell & Hauser, 1993; Sewell & Shah, 1967）。這模型解釋了在家庭背景與子女

的智力因素以外，個人的教育和職業抱負亦是重要的中介變項（Haller & Portes, 1973）。

由於個人的教育期望很難以一個整全的觀念去界定，大部分實證研究會利用教育程度作衡量指標。教育期望的形成在青少年發展階段尤為重要。隨着青少年成長，逐漸建立起對自我的了解，他們開始思索自己的興趣、理想職業或對未來教育的追求，在這階段有部分青少年仍感迷惘，另有部分青少年會逐漸建立起個人對未來升學就業的想法。

### 「先賦」條件和「成就」條件的影響

社會分層角度重視結構性因素對教育期望形成和取得的影響。「先賦」是指與生俱來或通過承繼而得的社會地位，如性別、種族、父母的教育程度和職業地位、文化和家庭資源等。這些結構性因素構成個人背景而影響教育期望的形成和維持。就性別方面，研究發現在英國及不少已發展國家，女生的升學期望較男生高，這可能跟基礎教育階段女生的成績表現較佳有關（OECD, 2010）。因此，女性在受教育或獲取就業機會上都有良好表現，在教育期望上甚至超越男性。

家庭結構是另一個影響學生形成教育期望的背景因素。部分研究結果指出，來自單親家庭的子女相比雙親家庭的子女，對未來教育普遍有較低的期望（Astone & McLanahan, 1991; Han, Huang, & Garfinkel, 2003; Wu, Schimmele, & Hou, 2015）。當中原因可能是單親家庭欠缺教育資源和物質資源，難以對子女的學業給予支援，因而削弱他們對接受專上教育的追求。Wang & Ngai（2011）的研究利用 PISA 2003 的數據，發現來自單親家庭的子女比來自雙親家庭者具有較低的教育期望，當中的差異可解釋為單親家庭的子女獲得較少家庭資本，這類資本包括父母的教育程度、職業地位和家庭物品。

過往研究均指出，父母的社經地位（包括教育程度和職業）影響子女的教育期望。父母教育程度愈高，子女對教育的期望亦愈高。學歷較低的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期望，相比學歷較高的父母為低（Abada & Tenkorang, 2009; Hossler & Stage, 1992; Teachman & Paasch, 1998; Wilson & Wilson, 1992）。Ball, Maguire, & Macrae（2000）的質性訪談發現，來自中上階層而曾受高等教育的父母，對子女的教養投入會較多，因而對子女的教育期望亦較高。相比之下，低下階層父母由於缺乏相關的知識和經驗，儘管他們意識到受教育的重要，但他們向子女傳遞相關期望仍較為困難。至於父母從事的職業，Payne（2001）從一項大型的國家研究數據中，發現父母從事專業、管理或技術性職業的子女，有 82% 期望選擇高中畢業後繼續升學；相反，父母從事半技術或工人職位的學生，只有 60% 期望繼續升學。這說明教育期望的差異與父母的職業有密切關係。

對於「成就」條件的研究則多集中以學業成績為評量教育產出的重要指標。一些研究發現成績好的學生，其教育期望比成績差的學生為高。這些研究指出，美國不同種族學生在標準化測試的成績表現中，中國裔及韓裔學生普遍成績較佳，其原因與學生及家長的教育期望有關（Hao & Bonstead-Bruns, 1998; Hossler & Stage, 1992）。

## 影響教育期望的因素

近年來，中、港、台三地的高等教育在辦學規模及入學率方面都不斷擴張。三地高等教育快速擴張的同時均走向國際化、強調鬆綁、着重學術自主，並朝着提升質素和均等的方向改革，三地高中學生對升讀高等教育的期望不斷提高（王如哲、楊瑩、劉秀曦，2012；趙慧珠、劉文達，2005）。

中外研究均顯示，家庭社經地位與學生教育期望有關，繼而影響其參與高等教育的機會（文東茅，2005；侯龍龍、李鋒亮、鄭勤華，2008；Andres Bellamy, 1992；Bourdieu, 1990）。中國的研究顯示，家庭社經背景對子女的教育取得有顯著影響：父母的社經地位愈高，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或進入重點大學的機會愈大（丁小浩，2006；文東茅，2005；王偉宜，2010；侯龍龍等，2008）。有關高等教育入學的研究亦愈來愈豐富，針對家庭背景和高等教育入學之關係的研究主要採用描述性統計、邏輯迴歸、多元迴歸、事件史分析，以職業與社會分層標準為基礎，對家庭階層與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關係進行研究，其中有些研究發現家庭背景對入讀高等教育具重要影響力，且有加強的趨勢（文東茅，2005；王甫勤、時怡雯，2014；侯龍龍等，2008）；亦有研究發現入學機會開始向弱勢階層移動，但弱勢階層在教育質量上仍處於弱勢（丁小浩，2006；王偉宜，2010）。

就東亞社會的研究而言，王杰（2013）有關日本學生學習期待變化的文章中引述有田（2002）及藤村（2009）的研究指出：高三學生的就業及教育期望受性別、兄弟姐妹人數、家長學歷及職業、校內學習成績及就讀學校背景等因素影響。然而，除了王杰（2013）的研究較有系統地追蹤了小六、初中三及高中三的學生外，同類研究都多以單一時段的橫向數據為分析基礎，樣本數量有限且代表性不足，對中學生的學歷、就業期待或選擇只做了相對靜態的分析，而學生教育期望可能出現的變化卻甚少受到關注。

與外國相比，東亞社會關於學生教育期望（尤其是父母期望和學生自我期望）的研究不多，實證研究則更少，大多數文獻還停留在對教育期望的經驗總結的層次。同樣，香港實施新高中學制後，更多學生完成十二年基礎中、小學教育，大專學位近年亦大幅增加，本研究特別關注在政策的轉變環境下，學生對教育期望（包括路向和規劃）上的改變。特別是在高等教育擴張後期，能根據大型而具代表性的數據分析

學生教育期望的變化，並與學生的能力、家庭社經背景等因素進行比較分析，實屬重要。

## 研究方法

### 數據來源和樣本

本研究數據來自 PISA 2009 和 PISA 2012。PISA 是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下稱 OECD）發起及統籌，旨在評估接近完成普及教育的 15 歲學童，對社會所需知識與技能掌握的情況，並建立教育指標，給各國政府及政策制訂者審視、評價和監察國家和學校層面的教育成效。PISA 的第一次評核週期（名為 PISA 2000）於 2000 年進行，當時有 32 個 OECD 國家參與。2002 年，10 個非 OECD 國家及地區加入稱為 PISA 2000+ 的計畫。2009 年香港的 PISA 調查在該年 5 至 6 月間進行，而 2012 年的調查則在該年 4 至 5 月間進行。本研究在數據選取上能反映由 2009 至 2012 年間高等教育持續擴張下學生教育期望的變化。

在 PISA 2009，來自 65 個國家和地區約 475,000 名學生參加了兩小時的測試，而 PISA 2012 則有來自 65 個國家和地區約 510,000 名學生參加了兩小時的測試。香港的 PISA 2009 和 PISA 2012 主測試研究均採用二段分層抽樣方法，在第一階段，研究按學校的類型（官立、資助和私立學校，私立學校包括國際學校和直資學校）和收生成績<sup>1</sup>（高、中、低能力）分組，有系統地從學校組別中隨機抽選樣本學校，選中機率與學校的學生人數成正比（見表一）。

在第二階段，每屆 PISA 均從每所參與學校隨機抽樣選取 35 名 15 歲學生。根據 OECD 的抽樣標準，2009 年共有來自 151 所中學的 4,837 名學生獲納入最後的分析樣本，而 2012 年則有來自 148 所中學的 4,670 名學生獲納入最後的分析樣本。表二顯示了樣本中的學生年級分布。

### 變項及其定義

本研究的依變項為學生的教育期望程度。在 PISA 2009 及 PISA 2012 分別向學生提問「你預期完成以下哪些教育程度？」，共設 6 個教育程度等級（1 = 中三；6 = 學士或以上學位）（見表五）。

基於本文的研究假設及問題，分析採用兩類自變項。第一類是「先賦」條件的變項，包括性別及家庭結構。根據過往研究結果，單親家庭會削減對子女經濟資源的支援，從而減弱他們對未來教育的期望。因此，本文納入學生來自單親家庭為變項，

表一：香港參加 PISA 2009 和 PISA 2012 主測試的學校分布

顯層	隱層	2009		2012	
		學校總數	參與學校數目	學校總數	參與學校數目
官立學校	高能力	16	5	15	6
	中能力	8	3	8	2
	低能力	7	2	7	2
	(不適用)	3	0	1	0
資助學校	高能力	120	44	120	46
	中能力	120	41	117	40
	低能力	132	39	126	33
	(不適用)	3	0	1	0
私立學校*	本地(直資#)	54	15	55	16
	國際學校	35	2	32	3
總數		498	151	482	148

\* 沒有私立學校的收生成績資料。

# 直資是參加「直接資助計劃」的學校。

表二：香港參加 PISA 2009 和 PISA 2012 主測試的學生年級分布

年級	2009		2012	
	參與學生人數	百分比 (%)	參與學生人數	百分比 (%)
中一	85	1.8	51	1.1
中二	353	7.3	300	6.4
中三	1,210	25.0	1,205	25.8
中四	3,185	65.8	3,088	66.1
中五	4	0.1	26	0.6
總數	4,837	100	4,670	100

以分析這些背景因素對教育期望的影響。表三顯示了 PISA 2009 和 PISA 2012 受訪學生的「先賦」條件。

當中，父母的社經地位亦構成學生的「先賦」條件，一般以父母的教育程度、職業地位及收入來衡量。OECD 把 PISA 2009 和 PISA 2012 內父母最高的教育程度、父母最高的職業地位以及家庭物品，建構成「經濟、社會及文化地位」指標，但家庭物品涵蓋範圍較廣，而且只能作家庭收入的代理變量 (proxy variable)。本研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萃取父親及母親的教育程度、父母最高職業地位變項的得分，成為一個標準化的指數，以反映受訪學生所屬家庭社經地位的指標。父母的教育程度共劃分為 5 個級別 (1 = 中三或以下；5 = 學士或以上)，由學生分別回答父親和母親最高完成的教育程度。而父母現時或最近從事的職業由學生自行填寫，將父母兩者中較高的職業地位納入「家庭社經地位」指標。



表三：受訪學生的「先賦」條件（2009 和 2012）

	2009		2012	
	參與學生人數	百分比 (%)	參與學生人數	百分比 (%)
<b>性別</b>				
男	2,557	52.9	2,509	53.7
女	2,280	47.1	2,161	46.3
<b>家庭結構</b>				
單親家庭	598	12.4	599	12.8
雙親家庭	4,126	85.3	3,780	80.9
其他	90	1.9	87	1.9
<b>父親教育程度</b>				
中三或以下	2,250	46.5	1,828	39.1
職業訓練	1,074	22.2	999	21.4
中五、中七、文憑／證書	702	14.5	764	16.4
大專（非學位）	164	3.4	202	4.3
學士或以上	480	9.9	539	11.5
<b>母親教育程度</b>				
中三或以下	2,291	47.4	1,828	39.1
職業訓練	1,215	25.1	1,181	25.3
中五、中七、文憑／證書	775	16.0	858	18.4
大專（非學位）	154	3.2	192	4.1
學士或以上	293	6.1	350	7.5
<b>父母最高的職業地位*</b>	45.17	(14.693)	45.86	(20.908)

\* 表示平均值，弧號內為標準差。

註：表中百分比是以該年參與學生人數為分母，百分比總和不足 100% 是由於部分資料不詳之故。

第二類是「成就」條件的變項，指學生能力。PISA 每次評核週期皆涵蓋閱讀、數學及科學測試，由於中文與數學是新高中課程的必修科，而科學只屬選修科，故此本研究以 PISA 2009 和 PISA 2012 測得的閱讀與數學成績得分為評定學生個人能力的標準。在 PISA 測試的過程中，每位學生接受兩小時的紙筆測驗，部分題目為多重選擇，亦包含問答的題式。表四顯示了 PISA 2009 和 PISA 2012 閱讀與數學科目的素養表現。

表四：受訪學生在 PISA 閱讀與數學科目的素養表現（2009 和 2012）

	2009		2012	
	平均值	標準誤	平均值	標準誤
閱讀成績	533	2.1	545	2.8
數學成績	555	2.7	561	3.2

## 分析方法

本文首先考查 2009 和 2012 年的學生教育期望，從而比較處於兩個時期青少年的教育期望變化，並探討「先賦」和「成就」條件的因素與學生教育期望的關係。其次，運用邏輯迴歸方法試圖探討「先賦」與「成就」條件對學生在高等教育擴張下升讀高等教育期望的影響，以分析各種因素對個人追求升讀大學課程上有否上升或下降的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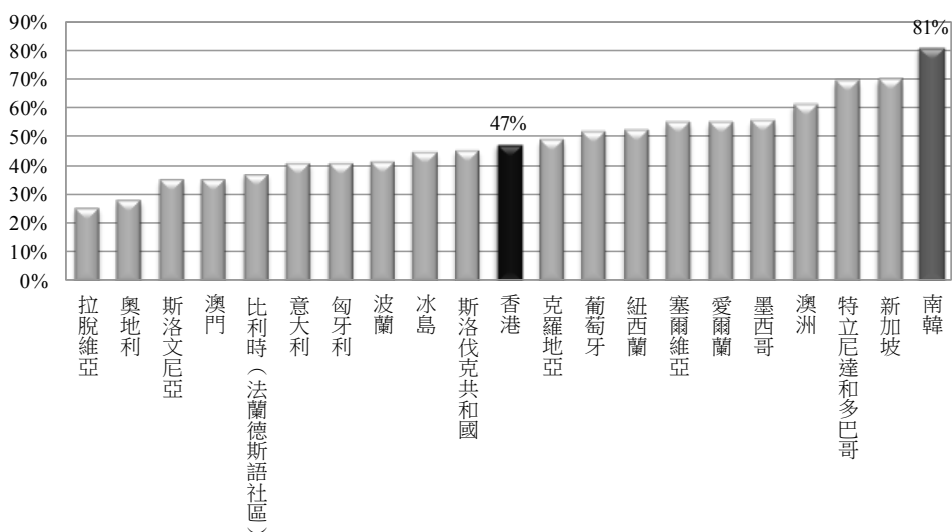
## 研究結果

本文將以 PISA 數據探討香港學生的教育期望，並從以下四個範疇分析及討論：（1）檢視學生的教育期望在 2009 至 2012 年間的變化；（2）分析學生的「先賦」條件（家庭社經背景）與教育期望之關係；（3）分析學生的「成就」條件（學生能力）與教育期望之關係；（4）探討「先賦」與「成就」條件的因素對學生期望升讀大學的相對影響程度。

### 15 歲學生的教育期望：2009 至 2012 年的變化

在 PISA 2009 的學生問卷中，其中一項問到學生期望完成的教育程度，共 21 個國家或地區參與。在是次參與研究的國家或地區中，澳洲、新加坡、韓國有超過 60% 的學生期望完成大學教育，香港則有 47%（見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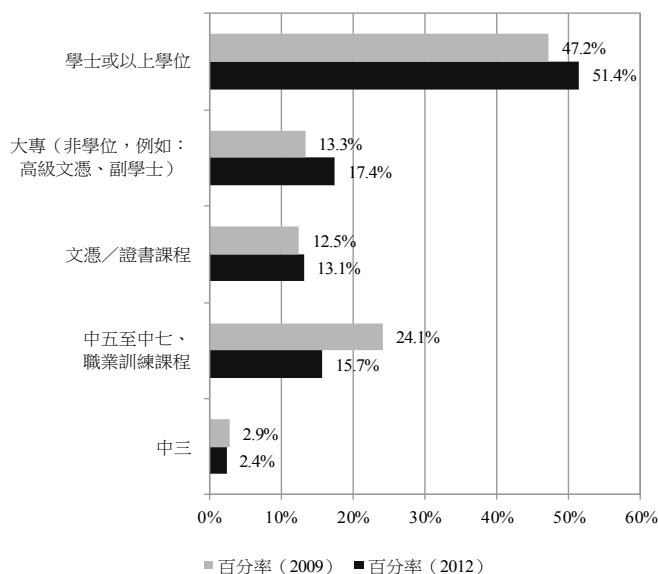
圖三：學生期望完成大學的百分率（PISA 2009）



學生對升讀大學的期望確實與各地大學學位的供應有關。例如，韓國近年提供的大學學額較多，在 2010 年入讀大學的百分率約為 70% (OECD, 2012)，所以相應地它有 81% 的學生期望升讀大學。在 2012 年，香港參加第五屆 PISA 的研究，繼續保留學生升學期望的研究問題，嘗試了解香港學生對升學的期望有沒有變化。

研究發現：於 2009 年大專及大學學額供應不足的實況下，香港學生仍有 47.2% 期望完成大學教育或以上，這顯示了香港學生的升學期望仍然甚殷。此外，期望升讀大專的學生有 13.3%，期望升讀文憑或證書課程的有 12.5%，總共有 73% 的香港學生期望接受高等或專上教育（見圖四）。至 2012 年新學制下，期望完成大學教育或以上的香港學生增至 51.4%，期望升讀大專的有 17.4%，再加上 13.1% 學生期望升讀文憑或證書課程，總共有 81.9% 的香港學生期望接受高等或專上教育。與 2009 年相比，2012 年 15 歲學生期望升讀學士或以上學位的人數上升 4.2%，期望升讀大專（高級文憑或副學士）的人數亦上升 4.1%，這可能跟這段期間副學位課程增加有關。

圖四：2009 和 2012 年學生教育期望的比較



## 家庭社經背景與教育期望的關係

家庭社經地位等「先賦」條件因素長期被視為影響學生教育期望形成的重要因素 (Abada & Tenkorang, 2009; Ball et al., 2000; Hossler & Stage, 1992; Payne, 2001; Teachman & Paasch, 1998; Wilson & Wilson, 1992)。本研究以父母的教育程度及父母最高職業地位作因素分析，建構家庭社經地位指標。

表五顯示 PISA 2009 和 PISA 2012 的數據：2009 及 2012 年，來自高社經地位（SES 為最高 10%）的學生分別有 74.9% 及 78.0% 期望升讀大學，來自低社經地位（SES 為最低 10%）的學生則分別只有 27.8% 及 30.9% 期望升讀大學，差異甚大。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學生無論來自高低階層，期望升讀大學的百分比均上升 3.1%。

表五：不同社經地位學生期望完成的教育程度（2009 和 2012）

	低社經地位	中社經地位	高社經地位
2009			
中三	6.0%	2.6%	2.6%
中五*	20.5%	11.1%	3.0%
中七*	17.5%	13.6%	3.8%
文憑／證書課程（例如：教師文憑、護士文憑）	16.5%	12.9%	5.8%
大專（非學位，例如：高級文憑、副學士）	11.8%	14.0%	10.0%
學士或以上學位	27.8%	45.9%	74.9%
2012			
中三	4.7%	2.1%	2.2%
職業訓練課程*	2.0%	1.5%	0.4%
中六*	25.5%	14.0%	3.9%
文憑／證書課程（例如：教師文憑、護士文憑）	19.7%	13.3%	5.4%
大專（非學位，例如：高級文憑、副學士）	17.2%	18.5%	10.0%
學士或以上學位	30.9%	50.6%	78.0%

\* 基於學制變化，本表列出的教育程度有部分差別，但其學歷等級根據 OECD 的劃分是相等的（職業訓練課程 = 中五；中六 = 中七）。

另一方面，表五亦顯示：低社經地位的學生對期望升讀文憑／證書課程及副學士等課程的期望，在 2009 及 2012 年均高於高社經地位的學生。來自低下階層的家長及學生較少期望直接升讀大學，原因可能是他們明白香港資助大學的學位嚴重不足，亦未能負擔那些自資學位或副學位課程，故此選擇完成中學後先投身社會工作。來自較富裕家庭的學生同樣面對短缺的大學學位，但其家庭經濟條件使他們可選擇到海外升讀大學，甚或就讀學費昂貴的自資副學位課程，再銜接升讀大學。這些可能的原因將會在未來的質性研究中，根據從學生家長的聲音作進一步探討。整體而言，隨着高等教育持續擴張，無論哪一階層的學生，期望升讀大學的趨勢均在上升。由此觀之，來自高、中、低階層的學生對大學學位需求均有升溫。

## 學生能力與教育期望的關係

以往研究發現，學業能力（「成就」條件）愈高，其教育期望亦相對較高（Cabrera & La Nasa, 2001; Hegna, 2014; Hossler & Stage, 1992; Mau & Bikos, 2000; Sewell et al.,

1969; Spera, Wentzel, & Matto, 2009)。以 PISA 2009 的數據分析，OECD 發現在 21 個國家或地區中，奧地利、香港、冰島和意大利均有多於 10%「高能力者」<sup>2</sup>不期望參與高等或專上教育。高能力學生中學畢業後不升學是人才的浪費，值得各個國家或地區關注（OECD, 2010）。

在 PISA 2009 和 PISA 2012，香港分別有 44.2% 和 59.8% 的高能力者（約 2,138 和 2,793 人）。表六顯示在 PISA 2009，香港高能力學生中有 12.8% 只期望完成中學教育（中三至中七），22.8% 期望參與高等或專上教育，只有 64.4% 期望升讀大學。這個百分比遠低於韓國的 94% 及新加坡的 88%。這些高能力學生是否因為家境困難而需要中學畢業後立即工作呢？或因在計劃升學的路上欠缺家人或師長指導而放棄升學呢？而且，香港資助大學學位嚴重不足，這會否導致不少成績優良但家境條件不足的學生不抱有升讀大學的期望？這方面將在下一節探討。

在 PISA 2012，香港高能力學生中有 67.3% 期望升讀大學，這個百分比稍高於 2009 年的 64.4%；約有 24.7% 期望參與高等或專上教育，比 2009 年的 22.8% 稍升；有 6.6% 只期望完成中六／中七，比 2009 年的 8.4% 稍降。這反映香港高能力學生在高等教育擴張下，升讀大學或大專的需求有升溫的傾向。隨着中學階段完結，香港高能力學生期望升讀大學的需求更為殷切。研究發現，學生期望升讀大學的原因與家庭及成績的關係密切（王杰，2013）。

表六：高能力學生期望完成的教育程度（2009 和 2012）

	學生的教育期望	
	2009	2012
中三	1.3%	1.1%
中五／職業訓練課程*	3.1%	0.3%
中七／中六*	8.4%	6.6%
文憑／證書課程（例如：教師文憑、護士文憑）	10.2%	9.0%
大專（非學位，例如：高級文憑、副學士）	12.6%	15.7%
學士或以上學位	64.4%	67.3%

\* 基於學制變化，本表列出的教育程度有部分差別，但其學歷等級根據 OECD 的劃分是相等的（職業訓練課程 = 中五；中六 = 中七）。

## 影響學生期望升讀大學的因素

基於以上的初步觀察，顯示了學生能力和家庭社經地位對學生教育期望存有一定影響。本研究以邏輯迴歸方法進一步分析影響學生期望升讀大學的家庭背景及個人能力因素。就學生能力方面，分析模型中包括了學生中一入學成績及在 PISA 評估的數學及閱讀成績；而家庭及個人背景因素則包括了性別、家庭社經地位及家庭結構。

依變量：利用 PISA 2009 和 PISA 2012 問卷中香港學生完成大學期望的結果作分析，題目問學生預期完成的教育程度，將答案重新編碼為 1（有升讀大學的期望）及 0（沒有升讀大學的期望）。

自變量：利用以下不同的自變量來預測學生期望升讀大學的差異，包括性別（編碼為女生 = 1，男生 = 0）；家庭結構（編碼為單親家庭 = 1，雙親家庭或其他 = 0）；社經地位是由父母最高職業地位、父親最高學歷、母親最高學歷的因素分析建構而成的連續變量（平均值 = 0，標準差 = 1）；而中一入學成績由教育當局提供，至於數學能力及閱讀能力是依據 PISA 直接測試結果得出，三者皆為標準分數（平均值 = 0，標準差 = 1）。

這分析會利用二元邏輯回歸分析（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去估算期望能完成大學水平或以上的概率。第一個模型會加入三項學生及家庭背景；第二個模型會加入中一入學成績、數學和閱讀成績，以及社經地位與各項學生能力的交互項，估算 PISA 2009 和 PISA 2012 兩個樣本各自的概率；第三個模型會將兩個樣本合併，並加入年分（編碼為 PISA 2012 = 1，PISA 2009 = 0），以及年分、社經地位與各項學生能力的交互項，估算兩個樣本之間的差異是否有統計顯著性，以及社經地位與學生能力對教育期望的影響在兩個時間點之間是否有顯著變化。

就學生背景而言，表七顯示香港女生與男生在升讀大學的期望上並無顯著分別。在 2009 年女性的勝算值（有升讀大學的期望與沒有升讀大學的期望的比值）為 1.045，即女性升讀大學的期望的勝算值是男性的 1.045 倍，男女十分接近。但在 2012 年女性的勝算值為 0.948，即女性升讀大學的期望的勝算值是男性的 0.948 倍，女生低於男生，但兩性差異在統計上並不顯著。這結果與英國及不少已發展國家的研究結果不同（OECD, 2010; Rampino & Taylor, 2013）。

家庭社經地位對升讀大學的期望則在統計上顯著相關：出身自家庭社經地位較高的學生，比社經地位低的學生有較高升讀大學的期望。表七顯示在 2009 年家庭社經地位的勝算值為 1.773，即社經地位每上升 1 個標準差，學生升讀大學的期望便增加 1.773 倍，階級差異在統計上顯著。在 2012 年家庭社經地位的勝算值更升至 1.875，亦即階級差異在統計上更為顯著。這意味在高等教育擴張下，中下階層升讀大學的期望未有改善，階級差異更為明顯。另一方面，單親家庭的影響並不顯著。以上升讀大學期望的階級差異是否與學生的基礎能力有關？

模型二加入學生能力因素（表八），顯示在 2009 年，中一入學成績、數學成績及閱讀成績三項與升讀大學的期望呈顯著相關。中一入學成績的勝算值相對較高（1.813），亦即中一入學成績愈好，對學生升讀大學的期望愈具正面影響。數學及閱讀成績亦具正面的影響，它們的勝算值相對較低，分別為 1.439 和 1.171。2012 年，中一入學成績、數學成績及閱讀成績與學生升讀大學的期望亦呈顯著正相關，勝算值

表七：影響學生期望升讀大學或以上的個人及家庭背景因素（2009 和 2012）

	2009			2012		
	系數 (B)	標準誤 (SE)	勝算值 Exp(B)	系數 (B)	標準誤 (SE)	勝算值 Exp(B)
個人及家庭背景						
女性	.044	0.063	1.045	-.054	0.067	0.948
社經地位	.573***	0.033	1.773	.628***	0.036	1.875
單親家庭	-.099	0.102	0.906	-.138	0.106	0.871
常數	-.092*	0.045	0.912	.161**	0.048	1.175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表八：影響學生期望升讀大學或以上的個人及家庭背景和學生能力因素（2009 和 2012）

	2009			2012		
	系數 (B)	標準誤 (SE)	勝算值 Exp(B)	系數 (B)	標準誤 (SE)	勝算值 Exp(B)
個人及家庭背景						
女性	-.108	0.080	0.898	-.204*	0.085	0.815
社經地位	.422***	0.038	1.526	.458***	0.041	1.580
單親家庭	.129	0.114	1.138	-.066	0.118	0.936
學生能力						
中一入學成績	.595***	0.051	1.813	.465***	0.054	1.593
數學成績	.364***	0.073	1.439	.442***	0.087	1.556
閱讀成績	.158*	0.074	1.171	.238**	0.084	1.269
社經地位 × 中一入學成績	-.022	0.052	0.978	-.027	0.053	0.973
社經地位 × 數學成績	-.018	0.067	0.982	-.135	0.082	0.874
社經地位 × 閱讀成績	.005	0.068	1.005	.044	0.080	1.045
常數	-.131*	0.054	0.878	.165**	0.056	1.180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分別為 1.593、1.556 和 1.269，與 2009 年的接近。而社經地位與各項學生能力的交互作用，跟學生升讀大學的期望在 2009 年和 2012 年均沒有顯著關係。

至於在個人及家庭背景方面，家庭社經地位對學生升讀大學的期望在統計上仍具顯著相關性，在 2009 年家庭社經地位的勝算值為 1.526，2012 年升至 1.580。從這些結果可見，父母社經地位和學生能力均與升讀大學的期望呈顯著相關，但從勝算值的分析來看，家長社經地位對學生期望入讀大學的影響比其數學及閱讀成績更大。同時，在高等教育擴張下，家長社經地位對學生期望升讀大學的影響並沒有減少，勝算值由 2009 年至 2012 年微升了 3.5%。女性勝算值則由 2009 年的 0.898 減少至 2012

年的 0.815，顯示女性在升讀大學的期望由 2009 年約低於男性 10% 再降至 2012 年約低於男生 19%。

模型三合併 PISA 2009 和 PISA 2012 的樣本，並加入時間因素（表九），顯示時間因素與升讀大學的期望呈顯著相關。年分的勝算值為 1.248，即 PISA 2012 升讀大學的期望是 PISA 2009 的 1.248 倍，反映在高等教育擴張下，學生對升讀大學的期望顯著增加。

表九：影響學生期望升讀大學或以上的個人及家庭背景、學生能力和時間因素  
（合併 2009 和 2012 樣本）

	系數 (B)	標準誤 (SE)	勝算值 Exp(B)
個人及家庭背景			
女性	-.154**	0.058	0.858
社經地位	.431***	0.038	1.538
單親家庭	.032	0.082	1.033
學生能力			
中一入學成績	.595***	0.051	1.813
數學成績	.343***	0.070	1.409
閱讀成績	.179*	0.071	1.195
社經地位 × 中一入學成績	-.026	0.037	0.974
社經地位 × 數學成績	-.068	0.052	0.935
社經地位 × 閱讀成績	.018	0.051	1.018
時間			
2012 年	.222***	0.051	1.248
2012 年 × 社經地位	.023	0.055	1.023
2012 年 × 中一入學成績	-.137	0.073	0.872
2012 年 × 數學成績	.122	0.102	1.130
2012 年 × 閱讀成績	.040	0.102	1.040
常數	-.096*	0.046	0.909

\*  $p < .05$ ; \*\*  $p < .01$ ; \*\*\*  $p < .001$

至於年分與家庭社經地位的交互作用，跟學生升讀大學的期望並無顯著相關，反映從 PISA 2009 到 PISA 2012，家庭社經地位對學生教育期望的影響並無顯著變化。但須留意，家庭社經地位的主效應（main effect）仍具顯著相關性（勝算值 1.538）。而年分與中一入學成績、數學成績及閱讀成績的交互作用，跟學生升讀大學的期望亦無顯著相關，反映學生的能力對其教育期望的影響在這段期間並無顯著變化。各項學生能力對學生教育期望的主效應與模型二的結果相若。



## 結論及建議

從以上分析香港 2009 和 2012 年 PISA 的數據，可歸納出四項要點。首先，自 2009 年至 2012 年，香港中學生對升讀高等教育的期望有所提高；而且學生升讀大學的期望由 2009 年度的 47.2% 升至 2012 年度的 51.4%，升讀大專的期望由 13.3% 升至 17.4%，升讀文憑或證書課程的期望亦由 12.5% 升至 13.1%。整體而言，高中學生對入讀大學及大專的訴求有初現的升溫效應，筆者進一步以 2015 年的資料印證，發現 2015 年中學生升讀大學的期望升至 55.2%，可見升溫效應持續。可是資料顯示在 2013–2014 學年只有 38% 的中學生升讀學士學位課程（梁振英，2014b，頁 17），此比率仍與 2012 年及 2015 年學生期望的五成以上有相當大的距離。

在回應中學生對高等教育的需求上，2014 年的施政報告關注點正落在規劃青年人的升學及就業上，以「讓有需要的得到支援，讓年青的各展所長，讓香港得以發揮」為主題，提出增加資助高等教育（梁振英，2014a，頁 21），其中兩項是資助學生接駁或就讀學士課程：「由 2015/16 學年起和緊接的 3 年規劃期內，逐步增加資助院校高年級收生學額共 1000 個；到 2018/19 學年，每年將有 5000 名表現優秀的副學位畢業生可升讀資助銜接學位」；「探討如何切實可行地推行一項新的資助計劃，資助每屆最多 1000 名學生，修讀配合本港人力需求指定範疇的自資學士學位課程」（梁振英，2014a，頁 21）。可是，每年政府資助的第一年學士學額仍然維持約 17,000 個（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2016）；若以 2016 年文憑試畢業生計算，在約 55,000 名日校考生中，取得大學入學資格（即在核心科目取得「3322」或以上成績）約有 23,700 人（香港考試及評核局，2016），即政府提供的學士學額仍未能滿足約 6,700 名合資格升讀大學的畢業生的需求。再加上每年數以萬計的副學士畢業生，學額仍是極之不足。施政報告承諾有 5,000 名表現優秀的副學位畢業生可升讀資助銜接學位，但其實關於副學位，除了要檢討與大學學位的銜接外，更值得關注的是畢業生的其他出路，可惜這方面甚少得到正視，仍需進一步探究。

其次，在高等教育擴張下，不同社經地位的學生對升讀大學的期望是升溫還是降溫呢？比較 2009 和 2012 年參與 PISA 的香港學生，發現無論哪一階層，期望升讀大學的學生人數均有上升跡象，表九的結果亦再次印證這一現象。整體而言，來自低社經地位的學生升幅最大，期望升讀大學的學生由 2009 年的 27.8% 上升至 2012 年的 30.9%，增長率為 11.15%；來自中等社經地位的學生，期望升讀大學的學生由 45.9% 上升至 50.6%，增長率為 10.24%；來自高社經地位的學生，期望升讀大學的學生由 74.9% 上升至 78.0%，增長率為 4.14%。由此觀之，隨着大專及大學學位擴張，期望升讀大學的趨勢在上升，其中以低社經地位學生的升幅最大，然而他們在升學上正好受着家庭經濟條件限制。不同階層呈現不同的升溫效應，施政報告又承諾為經濟有需要的學生提供更多資助，效果如何，需要進一步以 PISA 2015 年的資料印證。

第三，在一個公義的社會，學生（尤其是高能力的學生）不論貧富，都應有繼續升學的機會及想望，可是 2009 年的國際數據反映出香港高能力學生中，有約一成只期望完成中學教育，約兩成期望參與高等或專上教育，只有約六成期望升讀大學。這個百分比遠低於韓國及新加坡等的九成。2012 年，香港高能力學生中亦只有約六成七期望升讀大學，遠低於成績相近的東亞國家。香港社會大都相信教育是社會流動的基石，但香港的資助大學學額嚴重不足，很可能限制了高能力學生升讀大學的期望，這對學生個人而言是潛能未能發展，對社會而言是人力資源浪費。

根據《二零一四年施政報告》，政府承諾為經濟有需要的學生分別推展兩項資助計畫：一是「推行一項新的獎學金計畫，資助每屆最多 100 名傑出學生在香港境外升讀知名大學，以培育更多元化的頂尖人才，推動香港的發展」；二是「除一律獲發每年最高可達 25 萬元的獎學金外，有經濟需要的學生可另獲每年不超過 20 萬元的補助金」（梁振英，2014a，頁 21）。可是對於為數約 60,000 人讀專上及大學課程的學生而言，這些極為有限的境外學位及資助金額，對於每年數以萬計的自資學生及他們的家庭所背負的學債又是否杯水車薪呢？

第四，邏輯迴歸分析的結果顯示，單親家庭及性別等先賦因素與升讀大學的期望並無顯著關係，可是父母社經地位和學生能力均與升讀大學的期望呈顯著相關，社經地位與學生能力的交互作用對學生升讀大學的期望並不顯著，但從勝算值的比較，家長社經地位對學生期望入讀大學的影響比學生中一入學成績的影響為小，但社經地位卻比 PISA 中數學及閱讀成績對學生期望入讀大學的影響更大。這意味「先賦」的條件（尤其是社經地位）及中一入學成績對學生升學期望的影響十分大，甚至大於學生 15 歲時的數學及語文能力。

同時，比對 2009 和 2012 年家長社經地位的勝算值，家長社經地位對學生期望升讀大學的影響相當穩定而有些微增加，勝算值由 2009 年的 1.526 增至 2012 年的 1.580，而「成就」條件中三項學生能力方面，中一入學成績對學生期望入讀大學的影響卻有明顯下降（由 1.813 降至 1.593），PISA 數學及閱讀成績對學生期望入讀大學的影響卻有些微上升（分別由 1.439 升至 1.556 和由 1.171 升至 1.269）。雖然邏輯迴歸分析的結果顯示，年分與家庭社經地位的交互作用影響並不顯著，但社經地位的影響在 2009 和 2012 年均持續十分顯著，這是否意味着擴張高等教育並未能減弱社經地位的影響，大學教育看來仍未能迎向更均等化。

總括而言，以往的研究顯示家庭社經地位對學生升學的期望有顯著影響，香港的研究結果與其地國家的結果相當一致，家庭社經地位愈高，子女愈期望升讀大學。對於有足夠學業水準的學生，若因家庭經濟問題而放棄升讀大專或大學，是十分可惜且值得我們關注。另一方面，低下階層對高等教育期望卻步，本研究發現有跡可尋：香港高等教育的擴張主要在大專或大學的自資課程，弱勢學生考慮到當下家庭經濟

條件和畢業後要背負十多萬學債，這使得高等教育對低社經地位階層可謂遙不可及。最後，本研究結果顯示，高等教育均等化必須兼顧學生能力及社經地位等因素，使高能力學生能擺脫家庭背景的限制而追求更高的教育理想，盡展所長，這才是理想的高等教育政策。政府若能在升學及就業兩方面提供更多實際而又公平的機會及支援，令青少年對升學及就業抱有適切希望，將有望促進社會流動，減少跨代貧窮的情況。近期施政報告中有關高等教育的措施，仍未能回應學生對高等教育的殷切需求。期望有關措施能盡快檢討，使就讀非受資助課程的學生有較大的銜接渠道，令經濟困難但有能力的學生不會放棄追求升讀大學的期望。

## 鳴謝

本文作者特此感謝香港研究資助局優配研究金（General Research Fund）資助「香港青少年之追蹤研究」（A Longitudinal Study of Adolescents in Hong Kong: Transition from Secondary School, HKLSA）（編號：444412）。

## 註釋

1. 收生成績指中一學生的入學成績。
2. 在 PISA 2009，OECD 將各閱讀成績分為 6 個等級（第 6 級為最高），並界定達 4 級或以上的學生為「高能力者」。

## 參考文獻

- 丁小浩（2006）。〈規模擴大與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均等化〉。《北京大學教育評論》，第 4 卷第 2 期，頁 24–34。
-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2016）。〈統計數字〉。擷取自 <http://cdcf.ugc.edu.hk/cdcf/statEntry.do?language=TC>
-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14）。〈2013 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擷取自 [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633/201407/171144.html](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633/201407/171144.html)
- 文東茅（2005）。〈家庭背景對我國高等教育機會及畢業生就業的影響〉。《北京大學教育評論》，第 3 卷第 3 期，頁 58–63。
- 王如哲、楊瑩、劉秀曦（2012）。〈台灣高等教育評鑑的回顧與展望〉。《台灣教育》，第 674 期，頁 20–24。
- 王甫勤、時怡雯（2014）。〈家庭背景、教育期望與大學教育獲得：基於上海市調查數據的實證研究〉。《社會》，第 34 卷，頁 175–195。

- 王杰 (2013)。〈影響日本青少年學歷期待縱向變化的原因分析——東北地區某小城市的調查結果〉。《中日教育論壇》，第3期，頁46–55。
- 王偉宜 (2010)。〈高等教育規模擴張與各階層子女入學機會變遷研究〉。《北京大學教育評論》，第8卷第4期，頁120–130。
- 自資專上教育資訊平台 (2016)。〈統計〉。擷取自 <http://www.cspe.edu.hk/content/Statistics?lang=ZH>
- 吳克儉 (2014)。〈立法會：教育局局長就《2014年撥款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致辭全文〉。擷取自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404/16/P201404160620.htm>
- 侯龍龍、李鋒亮、鄭勤華 (2008)。〈家庭背景對高等教育數量和質量獲得的影響——社會分層的視角〉。《高等教育研究》，第10期，頁39–45。
-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2016)。《2016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成績統計》。擷取自 [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Exam\\_Report/Examination\\_Statistics/dseexamstat16\\_3.pdf](http://www.hkeaa.edu.hk/DocLibrary/HKDSE/Exam_Report/Examination_Statistics/dseexamstat16_3.pdf)
- 教育局 (2011)。〈公帑資助課程〉。擷取自 <http://www.edb.gov.hk/tc/edu-system/postsecondary/local-higher-edu/publicly-funded-programmmes/index.html>
- 梁振英 (2014a)。《二零一四年施政報告：讓有需要的得到支援，讓年青的各展所長，讓香港得以發揮》。擷取自 <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2014/chi/pdf/PA2014.pdf>
- 梁振英 (2014b)。《本屆政府上任第二年施政匯報：讓有需要的得到支援，讓年青的各展所長，讓香港得以發揮》。擷取自 [http://www.ceo.gov.hk/chi/report-yeartwo/files/Year2\\_Full.pdf](http://www.ceo.gov.hk/chi/report-yeartwo/files/Year2_Full.pdf)
- 趙慧珠、劉文達 (2005)。〈內地、香港和台灣高等教育若干問題的比較與借鑑〉。《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1期，頁154–160。
- 鍾宇平 (2005)。〈香港學生資助計劃與高等教育發展〉。《教育學報》，第33卷第1–2期，頁51–62。
- Abada, T., & Tenkorang, E. Y. (2009). Pursuit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among the children of immigrants in Canada: The roles of parental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12(2), 185–207. doi: 10.1080/13676260802558870
- Andres Bellamy, L. (1992). *Paths on life's way: Destinations, determinants, and decision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high school*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Vancouver, Canada.
- Astone, N. M., & McLanahan, S. S. (1991). Family structure, parental practices and high school comple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6(3), 309–320. doi: 10.2307/2096106
- Ball, S. J., Maguire, M., & Macrae, S. (2000). *Choice, pathways and transitions post-16: New youth, new economies in the global city*. London, England: RoutledgeFalmer.
- Blau, P. M., & Duncan, O. D. (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NY: Wiley.
- Bourdieu, P. (1990). *The logic of practice*. Cambridge, England: Polity Press.

- Cabrera, A. F., & La Nasa, S. M. (2001). On the path to college: Three critical tasks facing America's disadvantaged. *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 42(2), 119–149. doi: 10.1023/A:1026520002362
- Feliciano, C. (2006). Beyond the family: The influence of premigration group status on the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of immigrants' childre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9(4), 281–303. doi: 10.1177/003804070607900401
- Fraser, M., & Garg, R. (2012). Educational aspirations. In R. J. R. Levesque (Ed.), *Encyclopedia of adolescence* (pp. 807–812). New York, NY: Springer.
- Glick, J. E., & White, M. J. (2004). Post-secondary school participation of immigrant and native youth: The role of familial resources and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3(2), 272–299. doi: 10.1016/j.ssresearch.2003.06.001
- Goyette, K. A. (2008). College for some to college for all: Social background, occup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over tim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7(2), 461–484. doi: 10.1016/j.ssresearch.2008.02.002
- Gutman, L. M., & Akerman, R. (2008). *Determinants of aspirations*. London, England: Centre for Research on the Wider Benefits of Learning.
- Haller, A. O., & Portes, A. (1973). Status attainment processe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46(1), 51–91. doi: 10.2307/2112205
- Han, W. J., Huang, C. C., & Garfinkel, I. (2003). The importance of family structure and family income on family's educational expenditure and children's college attendanc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aiwan.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4(6), 753–786. doi: 10.1177/0192513X03254518
- Hao, L., & Bonstead-Bruns, M. (1998). Parent-child differences in educational expectations and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immigrant and native students.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1(3), 175–198. doi: 10.2307/2673201
- Hegna, K. (2014). Changing educational aspirations in the choice of and transition to post-compulsory schooling — A three-wave longitudinal study of Oslo youth.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17(5), 592–613. doi: 10.1080/13676261.2013.853870
- Hossler, D., & Stage, F. K. (1992). Family and high school experience influences on the postsecondary educational plans of ninth-grade students.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29(2), 425–451. doi: 10.3102/00028312029002425
- Kerckhoff, A. C. (1976). The status attainment process: Socialization or allocation. *Social Forces*, 55(2), 368–381. doi: 10.1093/sf/55.2.368
- Mau, W. C., & Bikos, L. H. (2000). Educational and vocational aspirations of minority and female students: A longitudinal study.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78(2), 186–194. doi: 10.1002/j.1556-6676.2000.tb02577.x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08). *Education at a glance 2008: OECD indicators*. Paris, France: Author.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0). *PISA 2009 results: What students know and can do — Student performance in reading,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Volume I)*. Paris, France: Author.
-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2). *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2: Highlights*. Paris, France: Author.
- Payne, J. (2001). *Patterns of participation in full-time education after 16: An analysis of the England and Wales Youth Cohort Study* (Research Report RR307). Retrieved from <http://dera.ioe.ac.uk/4577/1/RR307.pdf>
- Post, D. (2004). Family resources, gender, and immigration: Changing sources of Hong Kong educational inequality, 1971–2001.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85(5), 1238–1258. doi: 10.1111/j.0038-4941.2004.00274.x
- Rampino, T., & Taylor, M. (2013). *Gender differences in educational aspirations and attitudes* (ISER Working Paper No. 2013-15). Retrieved from <https://www.iser.essex.ac.uk/research/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iser/2013-15.pdf>
- Sewell, W. H., Haller, A. O., & Portes, A. (1969). The educational and early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proces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4(1), 82–92.
- Sewell, W. H., & Hauser, R. M. (1993). *A review of the Wisconsin Longitudinal Study of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Aspirations and Achievement 1963–1992* (CED Working Paper No. 92-01). Retrieved from [http://www.ssc.wisc.edu/wlsresearch/publications/files/public/Sewell-Hauser\\_Review.Wisconsin.L.S.S.P.F.A.A-1963-1992\\_CDE\\_92-01.pdf](http://www.ssc.wisc.edu/wlsresearch/publications/files/public/Sewell-Hauser_Review.Wisconsin.L.S.S.P.F.A.A-1963-1992_CDE_92-01.pdf)
- Sewell, W. H., & Shah, V. P. (1967). Socioeconomic status, intelligence, and the attain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40(1), 1–23.
- Spera, C., Wentzel, K. R., & Matto, H. C. (2009). Parental aspirations for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Relations to ethnicity, parental education, children's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parental perceptions of school climate.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38(8), 1140–1152. doi: 10.1007/s10964-008-9314-7
- Teachman, J. D., & Paasch, K. (1998). The family and educational aspiration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0(3), 704–714. doi: 10.2307/353539
- Wang, M., & Ngai, S. S. Y. (2011). The effects of single parenthood on educational aspir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ldren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Hong Kong. *Child and Youth Services*, 32(2), 135–154. doi: 10.1080/0145935X.2011.583175
- Wilson, P. M., & Wilson, J. R. (1992).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on adolescent educational aspirations: A logistic transform model. *Youth and Society*, 24(1), 52–70. doi: 10.1177/0044118X92024001003
- Wu, Z., Schimmele, C. M., & Hou, F. (2015). Family structure,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and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Family Relations*, 64(2), 205–220. doi: 10.1111/fare.12112

## **Analyzing Hong Kong Adolescents' Expectations for Pursuing Higher Education from PISA**

Esther Sui-Chu HO, Raymond Sin-Kwok WONG,  
Chrysa Pui-Chi KEUNG, & Kwok-Wing SUM

### ***Abstract***

*From 1965 to 1985,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was very slow in Hong Kong. Less than 5% of age-eligible adolescents were admitted to UGC-funded university degree program. However, since the mid-1980s, there has been an expansion of university places and the university admission rate has increased to 18% of the age-eligible population. In 2000,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proposed that the admission rate of higher education be increased to 60% within ten years. As a consequence, the participation rate of higher education was increased to over 60% from the school year 2000–2001 to 2005–2006.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change in expectation for pursuing higher education of Hong Kong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during the post-massification of Hong Kong higher education.*

*The data of this article originates from two cycles of 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 — PISA 2009 and PISA 2012. PISA 2009 in Hong Kong was conducted from May to June 2009, while PISA 2012 was conducted from April to May 2012.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the following four areas: (1) the changes in student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 during 2009 to 2012;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udents' family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and their educational expectation;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udents' ability and their educational expectation; (4) the relative impact of family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and students' ability on their educational expectation toward the pursuit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Keywords: educational expectation; higher education;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 adolescents*